

**The Pedagogy of Oppression: A Brief Look at ‘No Child Left Behind’ (Chinese Translation)**

**Ramin Farahmandpur\***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eter McLare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ranslated by: Liang Meng*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recent educational policies of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passed in 2001 are neoliberal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that favour outsourcing and downsizing methods of production in the name of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Under the neoliberal economic model, schools must perform similarly to corporate entities. Just as the Dow Jones stock indices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and represent the pulse of Wall Street, so too the Adequate Yearly Progress Report (AYP) measures and ranks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schools. One of the most pernicious results of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is that states can now indefinitely close or restructure “underperforming schools,” those that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by the AYP.

\* Assist. Prof. Dr. Ramin Farahmandpur teaches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Studies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 Prof. Dr. Peter McLaren teaches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压迫的教授法

浅论“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

彼德·麦克拉伦

罗明·费罗曼普

当前在公共教育领域内以标准化为基础的运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的早期。当时以Ellwood Cubberley为代表的众多“课程理论家”曾尝试着通过开发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设计课程，以使学校课程满足美国经济发展与需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冷战动荡时期，“回到基础”运动在“教师教育项目”及教育学研究生院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项运动的支持者决心使学校课程的设置不仅反映美国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而且能使学生在日益增长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中服务，以抵抗所谓的共产主义者的威胁。

1983年发表的名为“危险中的民族”的一篇报道是教育改革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同亚洲欧洲的对手相比美国经济的弱势表现，而这篇报道正是抨击了学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与2001年通过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教育策略，其背后的驱动力是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经济政策更倾向于外包和以效率为名义的缩小化规模生产。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背景下，学校必须发挥同企业相似的功效。就如同道琼斯工业指数衡量公司的业绩和

华尔街的脉搏。同样“完全年度报告”衡量评估公立学校的状况。

“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州政府可以无限制的关闭或重建没有达到“完全年度报告”标准的“状况不佳的那些学校”。

过分的强调考试导致了应试教育的症结。严格的义务制度，对有色人种学生的教条的教学，对标准化考试狂热的推崇（Jonathan Kozol曾将其誉为“绝望策略”——不平等的产物）这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量的出现。但是这种趋势产生了什么？正如Kozol所指出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差距越来越被拉大，与此同时我们经历了学校系统中在种族隔离制度一度取消后重新实行的种族隔离（当法庭也开始不顾及布朗协议的条款）。这也导致了Kozol称作的“种族隔离教育”。Kozol在报告中写道在美国大地区（有着最多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地区）48%的高中学校里不到一半的九年级学生能够在四年中毕业。从1993到2002年高中学生中不到一半的九年级班中能在四年中从学校毕业的人数有75%的增长。纽约州94%的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地区中，80%的学生可以在四年中从高中毕业。6%的以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为主的地区中，这个比例要少的多，大约只有40%。纽约州有120所高中（注册学生中有将近200,000少数族裔学

生)，Kozol曾观察到只有不到60%的九年级学生能完成十二年级。

再新自由主义决议摇摆不定的时候，“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决议渐渐的将进步主义的教育策略从“平等”转化到“足够”。“高标准”和“高要求”的辞令已经取代了中立或左翼教育学者低密度的社会公正性决议。Kozol揭露了以前用来解释有色人种学生学习成绩不良的原因的概念性结构。作为每天必行的惯例，学校用Kozol叫做“自动催眠的口号”来提升学生的道德标准。学校鼓励那些被定义为学习成绩不良的有色人种学生强化记忆一些短语，比如说“我行！”“我很聪明！”或“我很自信！”，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促进他们的学习成绩。

Kozol指出研究者需要做的研究不仅仅是有关贫穷和压迫的“心理作用”来找出学生面临的社会问题。他曾讨论到，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比如说医疗卫生，就业机会，来提高城市社区孩子的生活水平。

今天城市学校的组织形式以工厂生产线的原则进行。Kozol指出，“提高考试成绩”，“社会道德提升”，“目标绩效”，“时间管理”，“成功主导”，“自主写作”，“义务谈话”，“积极倾

听”和“零噪音”组成了公立学校演讲的主导话题。大多数城市公立学校采取了商业和市场化的“工作为主题”和管理化概念，而且已成为学校课堂教学中常出现的词汇。在这种“以市场化的课堂里”，学生进行“谈判”，“签协议”，对自己的学习有“所有权”。在许多教室里，学生可以自愿成为“铅笔经理”，“肥皂经理”，“门经理”，“线经理”，“时间经理”和“外套经理”。在许多四年级的教室里，老师通过“收入图表”记录学生的作业情况。在这些学校里老师被称作“教室经理”，校长被称作“教学楼经理”，学生则被称作“学习经理”。通常学生被视作“财产”，“投资”，“生产单位”或“球队队员”。学校则将学生需要学习的技能和知识视作将在教育市场消费的“商品”和“产品”。在当前“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的改革背景下，教师被视作“有效率的技师”去使用“严格Skinnerian检验”方法和技术来管理和教授教室内的学生。Kozol曾写道在这种以市场主导的公立教育模式下，公立学校的教师被视作“楼层管理者”，“教室的工作是将‘添加的价值’灌输给被低估的学生”。

让教育改革论者感到羞愧的是应试风潮在大多数城市公立学校大区成上升的趋势。在一些地区，标准化考试在幼儿园就已开始施行。一部分公立学校被迫从学校课程中减少甚至取消美术和音乐教

育。其他的学校则减少或全部取消休息 / 午休时间。大多数公立学校现在有考试协调员。比如在汇报情况的学校教室里学校管理者鼓励教师教授学生应试技巧和策略。洛杉矶联合校区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学期制评估性考试，测试学生的数学，科学，社会学和英文。整个地区每隔两个月测试学生一次。我们被告知这类地区评估性考试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春季末的全州标准化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在教职员工发展会议上，大多数的时间是用来讨论分享有效的应试方法和策略，或回顾全州考试标准。教师们也鼓励去参加讨论会和会议来学到更多方法使得教学工作能达到州标准。

当标准化的课程和标准化的考试日益增大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差距时，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的学生继续被放到职业技能课程和那些只教生活技能或在零售、服务行业的基础培训课程。更让人心痛的是许多高中女学生被放到缝纫和美容班里。众所周知，在今天这些课对于那些要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不会有很大的作用。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我们目睹这种工厂模式的教育产生了相反的功效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学生不久以前原本希望去工作的那些工厂正在离开这个国家，以逃脱工会的监督和工人高额的医疗福利。

“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条款已经除去了那些阻碍军方从高中生中招收新兵的障碍，尤其是那些无辜的城市公立学校中有色人种学生。军方采取不正当的新兵招收举措和策略来诱使高中学生入伍，比如到教室游说，每周打电话给有意愿的高中生来施加压力让他们参军。其他的方式包括开翰诺威吉普到学校大声播放希普霍普音乐，发放免费的体恤衫、贴纸。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军方在每一个有可能参军的高中生身上花费13,000美元，这同一个孩子在纽约公立学校系统内接受教育一年的花费相同。与其相对应，许多学生，老师和校长组织起地区性或全国性的联盟，比如说“反校园军国主义联盟”抵抗军队在社区内学校招收新兵的行为。近期，坐落东洛杉矶在拉丁裔工人阶层社区的罗斯福高中（被誉为全国海军新兵入伍第一校）的“学校领导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来限制在他们学校的新兵招收活动。

如果这一切还不够糟的话，以公共教育为代价国防预算支出持续增长。在2002-2003年度预算中，于去年相比国家税收猛降220亿美元。布什政府免除房地产税的决议将使得另有100亿美元税收的损失。布什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已经给公共教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校区削减教学项目和相关服务。正如David Goodman写道：

全国的学校在经受着经费削减的折磨。在加利福尼亚，3,800名的教师和9,000名学校员工去年收到了解雇通知书，地区减少了购买课本、夏季课程、校车、维修、体育、学生报刊、选修课程的等支出。在堪萨斯有一半的校区减少了学校员工；有几个校区甚至改为每周四天工作制；堪萨斯有50所学校对学生的部分课外活动收费。在密歇根，针对天赋学生的基金下降了95%；纽约布法罗在去年被迫关闭了8所学校，减少了600个教师职位。

面对经费短缺不足以支持现存的教学项目，许多教学区被迫与企业合作来迅速进入盈利性教育市场。比方说麦当劳近期采取的一个新策略来宣传针对高利润少儿市场的产品。这是在众所周知的名誉损害诉讼案之后。这场诉讼指的是“麦当劳名誉损害案”，及近期的电影“我是巨无霸”也引发了有关麦当劳食品加工和处理会很大程度增加儿童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伦理和道德问题。Nancy Hellmich报道到：为了恢复快餐连锁店日益衰落的公众形象和增加其市场占有率，麦当劳决定投资投资公立学校的体育教学项目。在31,000所公立学校里超过七百万的学生同意参加麦当劳的“运动通行证”活动。这项活动由许多多元文化体育活动，包括澳大利亚式的“回旋飞镖高尔夫”，日本的“道如玛跌倒”，荷兰的“荷兰式篮球运动”。学生每完成完成这些活动中的一项能够在通行证上得



到印有麦当劳图案的图章。据麦当劳的首席市场运营官Bill Lama介绍，“运动通行证”活动的目的是教育学生“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和“保持运动”。这样在策略上精心策划的方案使得麦当劳不仅从过去多年来负面的公众形象中恢复，而且能够在公立学校中建立了更多连锁店。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许多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和反对游行，其中也不乏反对公共教育的运动。这些运动中也有反全球化运动，移民权力运动，在法国反对新自由主义劳动立法大游行，阿根廷的工厂夺权运动，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和莫拉斯在玻利维亚的胜利，等等。这些运动相反促进了这些由社会运动，激进组织，工会，社区激进主义分子和致力于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普通市民所组成的联盟的成长。

大多数此类运动这种将新自由主义视作疾病所表现出来的迹象而不是一种疾病。但是在理解资本主义本质上存在着不足，即没有看到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理解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因此每一步至关重要是需要批判性教授法，当然包括激进教育运动，在每一步能推进参与者来思考和行动。